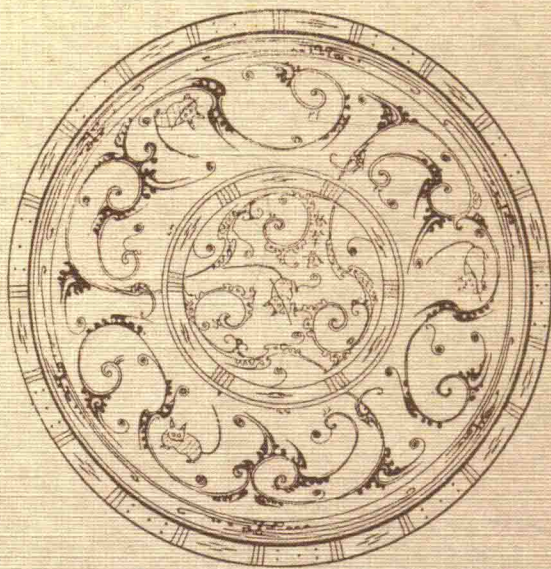

史论与论史

第一卷

(1986—2005)

梁景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史论与论史

第一卷
(1986—2005)

梁景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论与论史:全二卷/梁景和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161-7224-7

I. ①史… II. ①梁… III. ①史学—研究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116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 文
特约编辑 武 云
责任校对 董 昊 马君俊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40.75
字 数 665 千字
定 价 158.00 元(全二卷)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本书是我的文集，选取的论文基本上是公开发表过的文章，时段是在1986年至2005年的20年间。本书搜录的首篇文章是1986年9月24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史学家不可忽视今天》一文，这篇文章是在当时“史学危机”和史学地位弱化的背景下成文的。

我自1980年9月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1984年7月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本系硕士研究生，1987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0年可谓我入史学门的起点，从此我走上了学习史学专业知识的艰辛和漫长的路程。这让当初并不明显喜欢历史学的我开始系统地学习历史学的专业知识，并不断地认识和理解这门专业，以至逐渐把它与自己的终身职业和生活联系在一起。

长年与史学打交道，我开始慢慢试着思考些史学问题，也开始尝试着写点史学的文章。1986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小文，当时给我以鼓励，以至让我有了新的向往，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把它视为自己觊觎史学学术的开端。自此之后的八九年间，我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有了关注，完成了我的硕士论文《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习俗的变化》和博士论文《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并发表论文20余篇。我大约是在1985年开始对中国近代社会风气和社会风俗产生兴趣的，也试着写些小文练笔，并在1986年确定了我硕士论文的选题，这是我在近代文化史研究方向内的一个选题，后来觉得这一选题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有一定的联系。硕士毕业后，我仍然按着研究社会习俗的思路搜集和阅读资料，书写、修改并发表若干文章，比如《近代习俗变化的启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清末社会习俗变化的历史局限》（《史学月刊》1989年第2期）等。这一阶段，我还对史学理论的某一点有过细微的想法，曾发表《历史学三系统说》（《辽宁师范大学学

报》1989年第5期)一文,从“存在历史学”、“本体历史学”、“应用历史学”的角度叙述了历史学的三个系统,是想说明历史学的科学性、学理性以及历史学经世致用的价值等人们所关注的有关史学的几个问题,文章虽显浅见,却是自己思考所获。1991年秋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当年我就基本确定了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的选题,这是我1987年硕士毕业到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四年间生长出来的一个研究题目。其实攻读博士学位前后的这几年,我的学业视点就开始荡漾在文化史与社会史之间,并自认为是在从事社会文化史的研究。1994年,我在自己博士论文的提要中说明了自己博士论文的“社会文化史”的属性,认为我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是“社会文化史研究范畴的一个具体领域”^①。这篇博士论文在探讨婚姻、家庭、女性、性伦等陋俗文化变迁的同时,还探讨了一些文化问题,并对“文化”、“文化精华”、“文化糟粕”、“陋俗文化”、“婚姻文化”、“性伦文化”等概念作了界定,还进一步探索了“人的精神进化”的问题。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先后发表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女性习俗的变化》(《松辽学刊》1991年第3期)、《论五四时期的家庭改制观》(《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清末思想界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江汉论坛》1991年第3期)、《清末社会习俗的变革》(《中州学刊》1992年第6期)、《资产阶级上层集团与民初社会习俗的改造》(《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近代中国女学演变的历史考察》(《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论清末的“家庭革命”》(《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论中国传统婚姻陋俗的特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近代女性陋俗文化观的变革》(《江汉论坛》,1994年第9期)等学业论文。

通过攻读硕士与博士学位期间的专业训练,我慢慢走上正规的学业道路,并开始形成自己从事研究工作的某些特点,走上一个学业新的台阶,其标志是我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期间撰写的《论近代的“废婚主义”——兼论废婚过渡期的婚姻补充形态》一文。我带着这篇文章于1995年10月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这篇文章在论述近代“废婚主义”的同时,对未来世界废婚过渡期的婚姻补充形态进行了思考和阐述。这篇文章的问题意识和写作手法也可能会受到业内某些同仁的质疑,对此我表示接受和理解,学术本来就

^① 《〈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提要》,1994年5月,未刊稿。

是在讨论和争鸣中发展的，学术观点的启迪价值有时甚或高于它的史实价值。所以这篇文章的价值不在写作手法和学术主张以及学术观点上，而在它的问题意识上，即在为未来社会建造生活模型方面，史学也应该参与其中并发挥自身的功效，史学同样可以为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长远的哲学思考和大胆的微观创造。

在1995年至2005年间，我出版了专著《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版）、《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中国陋俗批判》（合著）（团结出版社1999年2月版）等。其间发表论文40余篇，主要包括《文化类型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5期）、《五四时期婚姻变化的变革》（《光明日报》1996年1月16日）、《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变革的局限及其规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五四时期伦理文化的论战与演变》（《人文杂志》1999年第2期）、《五四时期的“废婚主义”》（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武汉科技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重视研究五四时期的性伦文化》（《光明日报》1999年8月20日）、《近代中国女性陋俗文化嬗变述论》（《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秋之卷）、《清末国民性批判》（《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论曾国藩的家教术》（《孔子研究》2000年第2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西方思想理论与方法的回应》（《新哲学》，第1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版）、《论梁启超的国民思想》，（《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论五四时期的“性伦”文化》（《文史哲》2005年第1期）等等。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的学业旨趣又开始思考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问题以及对口述史的关注，并于2005年尝试撰写并发表了《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①和《关于口述史的思考》^②两篇文章，这标志着自己的学业经历又走向了一个新路程。

2015年2月22日

① 本文首先收录在《首都师范大学史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后经修改又被《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收录，以及在《山西师大学报》2010年第1期发表。

② 本文首先收录在《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后经修改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发表。

目 录 > > >

史论篇

史学家不可忽视今天	(3)
历史学三系统说	(5)
文化类型说	(11)
文化民族性的研究价值及文化民族性的成因探略	(20)
论民族文化的方式	(29)
民族心理与民族文化探略	(35)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西方思想理论与方法的回应	(41)
重视研究五四时期的性伦文化	(45)

论史篇

近代习俗变化的启示	(51)
清末社会习俗的变革	(58)
清末社会习俗变化的历史局限	(68)
资产阶级上层集团与民初社会习俗的改造	(74)
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论纲	(87)
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变革的局限及其规律	(111)
五四时期伦理文化的论战与演变	(119)
论近代的“废婚主义”	
——兼论废婚过渡期的婚姻补充形态	(128)
五四时期的“废婚主义”	(146)
近代中国的婚姻法规与契约婚姻	(155)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女性习俗的变化	(157)
近代中国女性陋俗文化嬗变述论	(165)
小脚“审美”与性意识	(177)
论五四时期的“性伦”文化	(181)
清末国民性批判	(194)
清末思想界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	(213)
《绣像小说》与民间迷信习俗批判	(223)
论曾国藩的家教术	(231)
论梁启超的国民思想	(245)
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	(258)
评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对外政策	(268)
俄国与甲午中日战争	(273)
反帝反封与排满革命	(278)

史评篇

从思想家的视角深化对左宗棠的研究	(293)
评《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	(298)
评《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	(301)
《东明民俗》序	(303)
辛亥革命 80 周年全国青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305)
辛亥革命 80 周年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关于社会文化史问题的 讨论述评	(310)

附录 我为什么要研究近代陋俗文化

——访青年学者梁景和	(315)
------------------	-------

后记	(324)
----------	-------

史 论 篇

史学家不可忽视今天

近年来，史学的不景气，不仅在于研究领域的狭窄和研究方法的单一，更在于它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与社会实际脱节的现象——即忽视了今天与明天。史学家重视今天和明天，不仅在于史学要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同时具有史学方法论的意义。

注重今天，对史学发展的意义在于：

首先，透视今天，发现问题，引发新的史学课题，拓展史学研究的领域，发展多样化的历史科学。靠阅读古书，翻阅历史资料来发现问题、确定研究课题是我们治史的方法之一。而观察今天，留心现实，从中发现历史研究的课题，同样是治史的一种方法。现实社会如同一个万花筒，包罗着千姿百态的社会现象，它可以引起我们对历史问题的思考。

其次，认识今天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历史。史学家生活在今天，对现实都有一定的感受，这种感受对治史大有益处。鸦片战争前，清朝闭关锁国，以天朝自居，几乎断送中华民族。今天实行开放政策后，有人鄙视自己的国家，这与近代社会形成的民族自卑感如出一辙。当然，历史与现实终究不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认识了今天，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

再次，注意索取今日世界在科学领域中提出的新的理论见解和新的研究方法，可作为史学研究的借鉴。当今社会，人类科学空前发展，新领域和新学科不断涌现，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很有必要。史学充分利用今天自然科学和交叉科学发展的各种成果，丰富唯物史观的理论范畴，这将为史学方法提供新的更为丰富的内容。

最后，通过对今天的观察和思考，改变史学家的思维方式。过去史学界，由于教条地运用历史唯物论，在治史上形成了一个单向性的思维特点。研究历史用一个模式套。探求历史现象之原因，无论是何具体问题，

往往热衷于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些大范畴来囫圇概括，把丰富多彩生动具体的历史简单化、凝固化；治史上这种单向性思维又与线性思维相联系，一谈中国近代史，就是三次高潮、十件大事。如果我们认真剖析一下现实社会就会感到，历史并不是那么简单。历史没有单一的发展动力，一果多因、一因多果的历史现象非常普遍。我们要多视角地观察历史，寻求历史的多种可能性答案。用我们那种习惯的单向思维和线性思维很难说清历史问题。我们要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从单向性思维变为多向性思维，从线性思维变为网络状思维，注重现实社会复杂问题的考察分析，有助于我们新思维方式的形成。

原载《光明日报》1986年9月24日

历史学三系统说

一 “历史学三系统说”的提出

以往我们研究历史，之所以出现很多不必要的争端，尤其在如何看待历史学的科学性（学术价值）与实用性（社会价值）上，争吵更是喋喋不休，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忽视了从理论上对历史学不同系统的划分。在实践中由于我们不自觉地从不同系统的视角观察、思考、判断史学问题，对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就自然会产生不同的答案，也就自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澄清历史学的不同系统：分辨不同系统各自不同的特征，掌握它们各自的研究方法，把握它们各自不同的价值所在。这对繁荣历史科学，提高历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都将大有益处。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通过对以往史学的考察分析，我认为历史学可以划分为三个系统，这就是“存在历史学”、“本体历史学”和“应用历史学”。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历史科学源远流长，从《尚书》、《春秋》、《左传》、《史记》开始至今，史学著作汗牛充栋。史学作为我国传统四大学术门类——“经”、“史”、“子”、“集”的其中一项，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一块瑰宝。正是由于我国历史科学的发达，所以古代史学家也有人曾经从不同的角度对史学进行过分类，如从唐人刘知几到清人章学诚，从戊戌维新派梁启超到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都曾先后进行过史学的分类工作。但是，他们的分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几乎都是着眼于史学的形式，按照史学形式的差别来划分不同的史学类别。如按照史学著作的源流分类，或按史学著作的体裁分类等。虽然历史上也有人把史学划分为“撰

述”和“记注”两大类，或把史学分为“记述的历史”和“历史理论”两大类，但他们都没有注意从历史学的功能上进行分辨和思考，从而划分出不同的史学系统。所以他们所进行的分类还没有脱离形式上的表层形态，对如何驾驭史学，充分发挥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建树不大。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开始自觉地思考史学的社会功能，先后对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历史科学的职能问题、古为今用问题、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等进行了反复的讨论。经过这种不断的长期讨论，史学工作者的认识逐步深化，历史研究也开始与社会实践逐步靠拢，体现了史学的社会价值。但是在史学理论上却没有深入进行历史科学类别划分的探讨和研究，这自然影响了史学的长足发展。“文革”期间，历史学科遭到摧残，被人利用，成为篡党夺权的御用工具。正是由于这一点，改革开放初期，史学的威信大跌。人们认为史学无科学而言，不过是政治的附属品而已，历史学出现了空前的危机。为了摆脱这种危机，为了还历史学的科学面目，更为了使历史学能为今天的现实服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史学界开始重视史学理论的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的开发和深入，有人开始意识到，要使历史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便于澄清史学本身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就有必要划分史学的不同类别，这是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一些史学工作者开始探讨和研究这一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蒋大椿根据史学与现实的不同关系，把历史学划分为“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两大类。蒋大椿对历史学的类别划分引起了史学理论界的争论。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对史学理论的一个贡献，其观点本身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而我的“历史学三系统说”与之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点。所谓相似之处，即我们都认为“应用史学”是史学中客观存在的一个门类，应当充分重视和大力发展；所谓不同之处，即我的“存在历史学”和“本体历史学”两大门类被蒋大椿的“基础历史学”涵盖为一，而我着意要把它们分开，认为只有分开，才能在形式上让人感到清晰明了，在本质上也合乎逻辑。从我下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存在历史学和本体历史学是区别较大的两个系统，把两者分开更有利于我们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下面就对“历史学三系统说”作梗概的阐述，以就教于同行专家学仁。

二 “历史学三系统说”之内涵、特征、功能

鉴于人们以往对历史学的理论系统划分的局限，基于这一理论的重建问题迫在眉睫，我以为从理论上应该对历史学进行这样三个系统的划分，即：

（一）存在历史学

我们所讲的历史特指人类社会的现象、事实以及反映内在逻辑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所谓存在历史主要指历史现象和历史事实而言，就是以往社会的一切现象存在，一切事实存在。它是表象的、外在的、能够被人感知的。对它的考证和研究构成了存在历史学。比如秦始皇是秦统一中国后的第一个皇帝，1898年中国出现了维新变法运动，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等，这些都是历史的现象和事实，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在以往的史学发展史上，典型的存在历史学是以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为代表的乾嘉史学，他们考证“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以及“年经事纬，部居世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这种不加任何褒贬，只是对历史现象和事实的考证被章学诚称之为“考索之功”，也就是我所说的“存在历史学”。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一书中指出：“今日关于考证个个史实的研究，虽然有显著的进步，然就大体上看，犹有极重要的事实遗剩下来，未能充分的以为讨究者，尚不在少；人们所最欲确知而不得其证据者，尚不在少；以是知学者对此之努力，仍不可一日懈。”李大钊的论述对今天“存在历史学”的研究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总之，存在历史学就是要整理历史过程的事实，完成科学的史料学的任务，如史料的钩稽、搜集、整理和考订，以及历史实迹的探究等。存在历史学的特征要求是准确性和客观性，即对历史现象和事实要给予时间、地点、本身状况及发展过程的准确回答，不能附加任何主观成分的臆测或褒贬。对历史现象和事实产生的任何误差都要破坏存在历史学的科学性。考证是存在历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存在历史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知识性、史料性以及它对后来社会各种不同程度的影响上。

（二）本体历史学

所谓本体历史主要指历史事物的本质，历史现象间的关系以及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逻辑和真理而言。对这类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构成了本体历史学。当代史学工作者所从事的许多史学研究，基本属于这一类。因为它一直是我们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所认定的历史学本身的涵义所在，也是以往和今后史学各系统中的主体，所以称它为本体历史学。比如封建社会中国农民战争爆发的历史因由、社会影响及成功、失败的教训是什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等，这类史学问题都属于本体历史学研究的范畴。本体历史学的特征要求是历史性和阶级性：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角度进行价值判断，而不能用今天的价值标准去评估历史，苛求古人，否则就会陷入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空谈，此外由于史学工作者阶级立场的不同，将影响他们对历史作出不同的判断，从而反映出本体历史学的阶级性来。毋庸讳言，本体历史学是为阶级服务的，超阶级的本体历史学是不存在的。例如，“四人帮”把1976年的“四五”运动视为“反革命政治事件”，而我们的党和人民则称之为场自发的反对“四人帮”的爱国运动。那么当代史学家只有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才能作出合乎本阶级利益的逻辑判断。本体历史学除了知识和史料的价值外，主要体现在它要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及内在规律，从而使人对历史有一个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使人察古知今，鉴往知来。

（三）应用历史学

这是一个应当受到高度重视和亟待开发的新领域。所谓应用历史主要指的是历史对现实社会的直接需要，同时也特指存在历史、本体历史作用于今天的人和社会后发生的各种效能和联系。对它的探讨和研究构成了应用历史学。比如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反迷信、反赌博、反封建婚姻等旧习俗与今天社会上的反迷信、反赌博、反买卖婚姻有什么可比性，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再比如中国封建文化对今天人们观念的影响是什么，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发生什么作用，这类问题应用历史学要给予回答。应用历史学的特征要求是时代性和应用性。要研究历史与现实相关以及历史直接

作用于现实的问题，而不是纯历史的问题。历史作用于现实，不同的时代，其功效是不同的，所以应用历史学要根据不同的时代给予不同的回答和解释。今天的应用历史学对明天来讲，由于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革，它从本质上就完全脱离了应用历史学的范畴，而转向本体历史学和存在历史学的领域。应用历史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寻求改造人、改造现实社会的方法。而运用这些方法所进行的改造社会的实践就体现了应用历史学的应用性。这里应当强调说明的是，应用历史学与御用史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后者是为所欲为地编造和歪曲历史；前者要求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后者全然不顾历史的科学真理性，两者切不可同日而语。今天要特别注重应用历史学的创建和发展，这对史学的发展，纠正史学脱离现实的弊端是一个极其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为了卓有成效地开展应用历史学这个新领域的研究和探索，我们应当首先思考这样几个问题：（1）注意观察今天，留心现实，从中引发新的历史研究课题。现实社会如同一个万花筒，包罗着千姿百态的社会现象，它可以引起我们对历史问题的思考，从而选择与现实关系密切的史学课题。（2）注意研究当代史，即从历史的角度，运用历史的眼光来研究现实问题，这有益于学术和社会需要。当代史学工作者注重研究当代史的优越之处在于有感性体验和感性认识，了解其发展过程，甚至细节，可为将来深入探讨打下基础。不注重当代史的研究是当代史学发展在战略上的失误。（3）史学要注意与未来学合作，给未来学输入史学的根据。史学家应当成为高水平的园艺工程师，通过嫁接发明新品种，即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取舍和综合，为人类提供未来社会具体领域的参考模型。这同未来学家不同，未来学家可从全社会的总体进行预测，史学家则在具体领域提供参考模型。注重以上三方面问题，有助于应用历史学的长足发展。

以上对历史学三个系统的基本内涵和特征等作了阐述，当然这方面问题还有待于纵深研究。下面对历史学三个系统之间的异同点再作简要的说明。本体历史学和应用历史学除了各自的特征外，两者还有其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与存在历史学相比，它们渗入史学家的主观成分要相对大一些。我们史学工作者事实上很难百分之百地从客观的角度来判断和评价历史，自觉不自觉地都要渗入主观的成分。强调史学家治史过程中渗入主观